

由传统走向现代：论中国史学的转型

刘俐娜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书 名：由传统走向现代：论中国史学的转型

作 者：刘俐娜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ISBN：7-80230--016-9

中图分类号 K

定 价：25.00

序

王桧林

我和刘俐娜早就认识。她在近代史所主要研究中国近代史学。我这个人“杂”而不成家，爱想一些学术问题，也愿意和熟人交谈。我们见面虽然不很多，但见面时往往谈论史学。我有一种想法，总以为中国近代新史学的产生，离不开民主思潮的影响，梁启超的《新史学》反对“正统”论、“书法”论就明显地反映了这种影响。近代史学家接受进化论，废弃以君权为中心的史学体系，没有民主思想渗透于其中是不可能的。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的大胆怀疑古史，一般史学研究者认为是五四时期思想解放潮流的一个侧面。但为什么是这样，大多没有提供较详细的材料和说明，甚至完全忽略了。刘俐娜的《顾颉刚学术思想评传》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予顾的思想和学术研究的影响作了专题论述，对于顾颉刚史学的继承与开新作全面的考察。把这种作法作为一种思路和观点，可以开扩和深化历史研究和史学研究。注意在中国历史演变的大潮流中选取史学研究的课题，可能是刘俐娜研究史学的优胜之处。她的书稿《由传统走向现代——论中国史学的转型》就是这样的选题。

近代以来，整个中国处于大变革之中，也就是转型时代。中国社会面临着转型，中国政治、经济面临着转型，中国的思想文

化也面临着转型。在整个社会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过程中，学术转型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史学又是学术中重要的一部分，它在近代发生转型是势在必行的。

中国近代新学术的建立（这里只谈人文社会科学）有两种情况，一是把西方的学科直接介绍进来，建立一些新的、原来传统学术中没有的学科，如社会学、人类学等；一是对传统固有的学科加以改造，使旧有学科在理论体系、表现形态等方面向新的方向转变。在我国有深厚基础的文史哲都属于后者。在文学理论上，这种转换表现为用现代文艺理论作指导研究古典的诗话、词话和文论等。在哲学上，表现为把缺乏系统的古代哲学思想加以整理和对其进行现代的解读并予以发展，建立起有严密体系的新哲学。史学在中国古代很发达，在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也有缺陷，需要向近代转化。

史学在转型过程中，由于是仿照西方的理论模式建立现代史学研究模式，这样就有一个如何保持中国史学本色的问题。但是认为向西方学习，进入西方的学术话语环境，就是屈服于西方的“话语霸权”，就会失去中国本色的说法，就有些过分了。中国史学既有旧的传统，又需要有新的科学体系，这就需要有一个由传统的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化问题。

研究史学转型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影响史学转型的外部条件。诸如社会思潮、政治观、人生观、世界观的变化必然对史学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如古史辨派就是五四时期思想解放的产物，顾颉刚的史学思想受民主思想的影响至深。时代变革，帝王将相的历史观被打破了，重视人民大众的历史地位，重视与民众生活关系密切的文化史、经济史，这是民主思想广泛传播的一种表现。没有这个条件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出现是不可能的。

史学转型当然是史学自身的变化。史学转型问题对史学来说是宏观的考察、整体上的考察。我以为史学的转型应包括下面几

个方面：

一是历史观，即基本的历史理论。过去的历史书中充满了天命观、帝王神圣论，近代的历史观则以进化论、历史唯物主义占主导地位，此外还有民生史观、文化形态史观等。这些变化反映了史学思想和历史观念的变化。前面两种新的历史观奠定了新的中国的史学理论基础。

二是史著内容。写历史，写什么内容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写的内容，在指导思想、观察角度、资料取舍等方面都与现代史学有所不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强调用阶级斗争观点分析历史、认识历史，突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和传统史学有很大不同。

三是史学功能。强调史学的功能是中国史学的重要传统。司马迁在《史记》中引董仲舒的话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这里可见古代对史学功能的极端重视。宋神宗把司马光等撰著的“历代君臣事迹”定名《资治通鉴》，把史学的资治作用表现得很充分。现代史学对传统有继承有发扬。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注重唯物史观、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育。李大钊特别重视史学对人生的作用，更明确地提出为政治服务。历史教学在传授历史知识中要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民族优良传统的教育。

四是史著的体系结构、内容的表现形式。近代史著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是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的综合体系。整体结构是编年、纪事本末、典志浑然一体的章节体系。而二十四史则不同。《史记》包括编年、典志、传记，但是分立的。实际上人类社会史是一个整体的发展史，综合体的新史书更能反映这种整体的发展状况。

从史学理论上，中国传统史学有很丰富的思想理念，但在

理论表述上，往往是“于序事中寓论断”。“理在事中”、就事显理是中国传统的哲学思维模式，历史理论当然不例外。二十四史中的“论”、“赞”就是史家的评论，是史论，没有成系统的史学理论。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历史理论很丰富，但囿于“道无方，以位物于有方；道无体，以成事之有体”的哲学思想，也没有形成体系。在古代，中国哲学与史论都没有系统的著作。朱熹的思想大多是语录式的表述，张载的《正蒙》也是一篇一篇分立，没有逻辑结构。中国古代，只有部分佛学著作的哲学思想是有体系的。这种情况到近现代才有改观。1924年出版的李大钊的《史学要论》是较早有体系的史学理论著作。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也是有体系的理论著作。

中国史学在近代的确发生了转型，这个转型是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这是众所公认的。但是，对于史学这样一门学科来说，其转型的方方面面是很广泛和具体的，所以仅对转型进行宏观的概括的论述是远远不够的。刘俐娜的这本书稿在对史学向现代转型的具体内容上下了一番功夫，她希望对这一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史学转化过程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描述，也希望把一些重要的史学观念和研究内容、方法等的具体转化过程展示出来。她的书是这样安排的，在整体构思上分上下篇，上篇论述史学转型的外部条件和史学转型的基本大势，分析20世纪初年社会政治变动对史学的影响，勾画出世纪初新史学潮流到五四时期新史学思潮引起的史学发展变革即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历程。下篇具体讨论现代意义上历史学科的建立和规范、现代史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史学研究方法的更新与发展，以及史料整理和史著编撰的变革等问题，分析了传统史学是如何转向现代史学的。这样的结构有利于从内外照应、宏观和微观结合两个角度说清楚问题。特别是从一个个具体史学问题的变化入手分析转型经历，这样就使概括性的论述显得具体而深入。书稿把李大钊、顾颉刚、蔡元培、王国

维、傅斯年等个人的新史学思想作为史学转型的例证，将个人的思想演变与时代思潮的演变结合起来，这样有利于以个人思想的复杂性说明时代思想的丰富性和史学转型的复杂性。

本书稿在史料利用方面比较广泛。以往研究同类课题的学者使用的材料基本上限于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胡适、李大钊、顾颉刚等著名学者的文章和书籍。本书作者在此基础上还充分利用了柳诒徵、何炳松、李泰璿、陈黻宸等人的书、文，并从南京高师的《史地学报》、北京高师的《史地丛刊》等刊物上收集了不少材料。此外，作者还利用了一些非史学性报刊如《晨报》、《民国日报》、《今日》、《东方杂志》、《现代评论》上的材料。掌握史料的丰富和熟练运用，使得书的内容很充实，论述也具体而深入。

在史学转型过程中，进化史观、唯物史观，以及其他新史学思想都产生了积极的推动影响作用。以新观点作指导写的中国历史最早有 20 世纪初期的一批中国历史教科书，其中最受称赞的是夏曾佑著的 1904 年开始出版的《最新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国历史》。另一本书在史学的开新方面应该重视，就是杜亚泉编的 1902 年出版的小学教材《普通新历史》。关于此书，杜亚泉说：“我国民之眼界，断不可仅注于内国数十朝之兴替沿革中，须考察种族势力之强弱、文明之高下、能力之大小，以为大家警醒振拔之标准。”这是关于历史教育的一种新思想。到五四时期有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等。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著作，突出的代表是稍后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些都是史学转型过程中的具体表现。

读了书稿以后，我感到史学转型的深刻性和复杂性，在研究上很有难度。书稿论证了中国史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这一关键性的课题，是一项重要的史学研究成果。但仍有不足之处，如传统史学具有什么样的缺点局限，使它必须向现代史学发展，论述不

够。又如，西方哲学、科学传入中国后，突破了传统的史学思维模式、撰史模式的局限，这是一个极大的进步。但至今仍缺乏系统完整的史学理论专著，原因何在？与中国传统史学有何关系？对这类深层问题如能在近代中国史学转型中加以探讨，会加深史学转型的研究深度。西方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对中国学术（包括史学）转型是有很大大影响的，而一般研究者多未论及，本书也是如此。

总的来看，在研究近代史学转型的诸多论著中，刘俐娜的这本书可以说是一部更全面更深入的有新见解的著作。

序

陈其泰

20 世纪初期的 30 年，是中国史学发生空前巨大变革的时期。在此以前，虽然由于鸦片战争这场大事变的刺激，史坛已有了一些重要的新变化，如《海国图志》倡导了解西方、“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日本国志》则是中国人亲自考察日本明治维新而写成的史著。尽管有了这些可喜变化，但从总体而言，史学近代化仍处于酝酿和积累时期。当历史跨进 20 世纪大门以后，“新史学”思潮如春雷动地，以梁启超、夏曾佑为代表的一批史论和通史名著撰成，标志着近代史学的正式产生，以前长达半个世纪的渐变至此发生了质的飞跃。从此以后，有识史家无不将自己的事业视为“新史学”的继承者，尽管前进的道路难免有曲折，但是史学近代化的潮流却不可阻挡。至五四时期，由于“民主”和“科学”时代思潮的推动，由于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强劲输入，史坛的变革更是至深至广，蔚为大观，而且影响十分深远，在诸多方面为此后数十年的史学发展提供了新的范式，因而被称为“现代史学体系建立”的时期。源远流长、素称发达的传统史学至这一时期终于开出新局，面貌一新，因而这 30 年被称为“中国史学重要的转型时期”。对于优良传统的自觉继承和反映社会前进、学术嬗变要求的大胆开拓创新，在这里得到交融。在著史

目的上，从以往的为帝王将相立传、为封建皇朝歌功颂德转变为叙述国家民族盛衰、人群进步，反映社会情状变化的历史，探求历史演进的因果关系，甚至要探索发展的规律。从历史观上，由以往的英雄史观、循环史观以至倒退观点，改变为进化史观为指导认识历史，其后更有开始运用唯物史观解释历史的著作。在著史内容上说，从以往偏重政治史、军事史，扩大到经济史、民族史、外交史、文化史、宗教史等广阔领域。还有新的史学观念的相继出现，治史方法的迥异往日，令人耳目一新的、系统叙述历史、章節目层次井然的崭新史书体裁的普遍使用，长篇的论点明确、组织严密的历史论文不断问世，等等。不夸大地说，这 30 年史坛的深刻变革，超过了过去几百年。

20 世纪前 30 年中国史学的转型，即是传统史学的终结、史学近代化的深化和现代史学体系的创立，时代特征极其鲜明，内容丰富深刻，涉及众多的史家、史著和史学问题，对此下功夫进行梳理、总结、分析，不仅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有突出的理论意义。职是之故，近年来有不少研究者关注这一领域，出现了一批相关的论著，刘俐娜副研究员的专著《由传统走向现代——论中国史学的转型》即为其中的最新成果。读了这部书稿，我至感欣喜，认为它至少具有以下三个特色。第一，全面、深刻地总结了 20 世纪前 30 年史学转型的阶段特点、发展途径和重大意义。作者以独特的视角，将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历程中肯地概括为 19 世纪末叶“困境中觅路”，20 世纪初年“改革中求新”，和五四时期“在更为自由开放的环境中，进入全面建设现代史学的阶段”。对于头绪纷繁的史学转型之内容和途径，又能从大处着眼，提炼出历史观念、研究对象、史著内容、研究方法和史著体例等五个重要方面的更新和改革。以翔实的史料和深入的论证，揭示出历史观念的变革，集中体现在借鉴西方新史学的理论和学说，通过厘清历史概念，引进新的历史哲学和历史观，建构现代学术

意义上的历史学科；研究对象和内容的变化，是通过对传统史学研究目的和功能、对象和内容，以及研究任务诸方面的反思和批判，建立起“重今”的、为普通民众服务的、关注民众生活的、在记述的基础上探求历史发展规律的新史学理论体系。凡此，均能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发前人之所未发。第二，发掘新材料，提出新问题。如，民国成立之后数年，政治上是北洋军阀统治的黑暗时期，文化上处在尊孔读经的反动逆流之下，故以往对这一时期的史学论述不多，更少有肯定。作者通过认真的发掘，分析史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当时复古思潮虽一定程度上阻滞了新史学的发展势头，但也提供了反思传统和谋求进取的机会，并以王国维对“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为史学”所作的界定，严复对“文明史”与“政治史”二者关系的论述，蔡元培对中国伦理史的开创性研究加以论证。又如，柳诒徵以往被不少人视为是思想保守的学者，作者通过对柳氏所著《历代史略》、《中国商业史》等著作的评价，认为他的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范围，而是在研究内容、方法和体例上都已具有了现代史学的特征”。书中对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成功运用，顾颉刚创立“古史辨派”的意义，傅斯年的史料学思想，唯物史观的指导使历史研究成为一门科学等项，都作了重点的分析，创获尤多。第三，不发空论，言必有据。全书文气贯通，条理分明，结构上尤匠心别见。上篇三章是纵论史学转型历程的演进趋势和阶段特点、基本脉络；下篇四章，提炼出史学转型的实质内容和转变途径，抓出重点问题，分别从学术范式、理论体系、研究方法和史料整理与史书编纂等四个方面进行剖析。上下篇互相发明，互相补充，形成有机联系，使全书成为紧密的整体。本书的出版无疑将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具有积极的推进意义。

刘俐娜副研究员对治学具有执著的精神和严肃认真的态度，十几年来，她围绕五四前后学术近代化的进程，先后发表了多篇

有价值的论文，并著有《顾颉刚学术思想评传》一书，在此基础上又把研究范围扩大到对 20 世纪前 30 年史学转型的研究。本书系她在近代史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两年前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又认真地进行补充修改。我以为像她这样对学术执著追求、不断进取的精神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我与刘俐娜副研究员是史学同行，因年龄居长，承她征序于余，辞不获免，故草此短文，写下我对本书学术价值的观感。相信刘俐娜博士一定会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以此为新的起点，在今后史学研究的道路上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导 言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作为学术门类之一的史学产生之后，便逐渐形成一定的、与所处时代社会政治及文化相适应的研究模式。一定的史学研究模式是研究者在史学观念、史学研究目的和功能、研究对象和内容、研究方法和史著形式等诸方面形成相对一致认识、共同遵守的一般研究规范，并通过代表性的著作体现出来的。史学模式一旦形成，将直接影响和决定史学研究的性质和特点，并在一定阶段内保持相对的稳定。

通常由史学研究模式的变化来体现的史学发展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通过自身内部的调整，不断地部分地改变原有的观念、方法、规范等以完善既有模式来实现其发展；一是全部或大部更新原有的观念、方法、规范等，形成新的研究模式取代原有模式来实现其进步和发展。前者在原有的研究模式中就能完成，而后者则需要变革原有的研究模式才能实现。

史学转型是指后者，表现为两种不同类型研究模式之间的转换，是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变革性发展。史学的变革性发展之所以发生，主要是由于各种新的社会和学术因素的产生和迅速增加，显现出原有研究模式中观念、方法和规范等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和新的学术发展要求等矛盾，从而激发了研究者冲破原有研究模式，建立新的研究模式的愿望和要求。当新的因素或成份

增加达到足以替代原有模式的程度时，新的“典范”式著作出现及被普遍接受，史学研究模式转换的过程也就基本完成了。通常史学的发展都是通过具有新思想和新观念的研究者来实践和完成的，旧模式转换为新模式的史学变革性发展同样如此。只是，与一般不改变旧有研究模式的发展形式相比较，变革原有研究模式的发展既需要史学具备内在的前进动力，更需要有新的社会政治环境和思想文化氛围。

本书探讨的是 20 世纪最初 30 年间中国史学由传统研究模式向现代模式转变的历程。

中国史学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传统，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传统史学不断地进行自身的更新和完善，达到了较高的发展水平，并以服务于传统的社会政治和文化为目的，形成了以二十四史为“典范”的，与传统社会发展始终保持着相互适应关系的研究模式。传统史学既保证了社会政治统治的需要，又满足了传承文化文明的职责。如果没有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根本性的变化，传统史学仍将沿袭其原来的模式发挥着它原有的作用。但到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年，传统史学受到猛烈冲击，出现一个转换研究模式的变化，这与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革有直接联系。

回溯传统史学的发展，可以看到自清代以来史学领域中就有一些具有近代特征的新的学术因素出现。但总体上看，这些新因素并没有超出史学自身完善和发展的范围。也就是说，这些新因素的近代学术特征还没有强到足以影响史学研究模式转变的程度。鸦片战争后，传统史学为了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也有了一些适应性的变化，但这些最终也都还没有能使晚清的学者意识到史学研究模式的更新转换已势在必行。随着洋务运动、戊戌维新思潮的兴起，外来思想文化越来越多地传入，其影响也愈益深入，新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文化的逐渐形成，传统史学与近代社会

的矛盾也愈加明显。直到此时，变革传统史学，建立新史学才成为进步学者的意识，提上了日程。

从 20 世纪初年梁启超等发起新史学运动，到 20 年代新史学思潮再次全面兴起，经历了两次新思潮的中国史学基本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国近代史学转型始于民族危机严重、社会迫切需要改革时期，基本完成于新文化运动深入发展后的 1920 年代末年。这 30 年正是清末民初中国社会政治与思想文化急剧变革和转型的重要时期。随着清王朝垮台、中华民国的建立，中国社会政治开始由传统封建专制政治向近代民主政治转变，与此相伴随的是传统的思想文化向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和特征的思想文化转变。这一系列转变既为史学转型提供了机遇，也成为史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推动力。可以说，中国史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是中国社会转型对史学发展提出的新要求，也是史学自身在不同于传统的新的社会环境中发展的必然趋势。社会的转型推动了史学的转型，而史学的转型在一定意义上也丰富和深化了社会转型的内涵。这是中国史学转型的独特之处。

短短的 30 年，史学在研究模式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观念上，倒退、循环为主的传统历史观转向进化的、文化的和唯物的历史观；在研究对象和内容方面，帝王统治阶级为中心的政治史转为面向民众的、与社会生活相关的历史；在研究任务和目的上，记述史实转向在记述史实的基础上，进一步解释和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研究方法上，由对传统治史方法的更新和发展走向借鉴科学的、各种与史学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史著

中国近代史学出现的背景与西方新史学的兴起背景不尽相同。西方新史学主要是在 19 世纪初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得到极大发展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有着丰富的科学基础。而中国近代史学则是在中国社会变化所导致的思想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出现的，相对缺乏科学发展基础。

体例、体裁上，传统的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等发展为适合表达现代史学思想和内容的章节体、专门史等。在批判和质疑传统史学的同时，现代的史学理论体系逐渐形成和确立。新史学观念的树立、新的史学著作出版，以及新的史学流派和史家的涌现，标志着中国现代史学的建立。

中国史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这段历史在中国现代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还在其转型的过程中，一些学者，如李大钊、胡适、顾颉刚等人就很强烈地意识到更新旧史学、建设新史学的重要。到 20 世纪 40 年代出现了一批研究新旧史学变化，关注史学新的发展趋势的论著。1941 年，周予同在《五十年来的中国新史学》一文中把清末民初至 40 年代称为史学的“转变期”，认为：“在这一时期内，史学著作虽还没有形成另一种定型，但与第三期（发展期）的史学著作，无论就历史哲学或历史方法论方面，也就是章学诚所谓‘史意’、‘史识’、‘史学’、‘史法’各方面，已逐渐不同，实无容否认或讳言的事。”他还集中论述了“转变期”中国史学所发生的一系列新变化。1943 年，金毓黻《中国史学史》中有“最近史学之新趋势”一节。1947 年，顾颉刚的《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以民国成立为限把百年来的史学发展划分为两个时期，认为民国以后“史学的面目是颇为新颖的”，“中国史学进步最迅速的时期是五四运动以后到抗战以前的二十年中”。这期间“中国史学由破坏的进步进展到了建设的进步；由笼统的研究进展到分门的精密的研究；新面目层出不穷，或由专门而发展到通俗，或由普通而发展到专门；其门类

周予同把中国史学发展划分为四期：殷商至春秋以前是“萌芽期”，春秋经战国至汉初是“产生期”，汉初至清末民初是“发展期”，清末民初至 40 年代是由旧向新的“转变期”。

周予同：《五十年来的中国新史学》，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第 514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之多，人才之众，都超出于其他各种学术之上”。上述几位学者都很敏感地捕捉到了近代以来中国史学更新变化的信息，并加以分析研究。这些研究者身在史学转型的经历过程之中，他们为转型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新中国建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中“五朵金花”等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一度成为研究的中心，使得史学史和近代以来史学更新的研究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后，史学进入了一个全面恢复发展的阶段，史学史的研究也开始恢复。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的研究，由最初仅仅关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的研究渐渐扩展到了各个史学流派，对不同时期的史学发展状况也都有研究。近十几年来，有关近现代史学史研究的著作不断问世，并由教材上升为专门性的论著。

这些成果勾画出了中国近现代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近现代史学史因缺乏研究而形成的弱势和不足，为进一步深入探讨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的转型做了学术上的预备。在20世纪末的十年中，随着学术史、文化史研究热的兴起，史学界也开始关注史学的现代化，以及史学转型的研究。

海外学者余英时则较早从学术转型的角度肯定了胡适对中国学术发展的重要作用。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一文中，他借用库恩（Thomas S. Kuhn）科学革命理论阐释了胡适的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第3~4页，胜利出版公司出版，1947。

如：吴泽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史》（1989），张岂之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1996），胡逢祥、张文建的《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1991），陈其泰的《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1994），蒋俊的《中国史学近代化历程》（1995），俞旦初的《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1996），张书学的《中国现代史学思潮研究》（1998），罗志田主编的《20世纪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2001），以及香港中文大学1986~1988年出版许冠三的《新史学九十年》（两册），等等。有关成果不胜枚举。